

盛克猷著

領袖的
救國教育思想及其方法



獨立出版社

印行

序

我國自廢除科舉，實施新教育以來，未曾有適應現代需要之教育理論與方法。故推行迄今，垂數十載，而功效不著，良可慨也！惟我領袖蔣介石先生，承總理遺教，領導全國民衆，南北犇馳，艱苦奮鬥。更探迥中國歷史，依據中國國情，吸取現代思潮，與夫自身致力於民族復興之經驗；一併發揮而為救國教育思想，實集中外教育思想之大成，創中國數千年教育思想之紀元，固非近代一般抄襲之教育思想所可同日而語也。讀之警謂吾人曰：「當然我國只要有決心，有血性，用各種方法都是有效。教育之難而其中最容易最有收的，莫如教育」。又曰：「現在我們舉國同心，惟有教育最容易最實行，而且教育界的責任也最重大」（見救國的教育）。教育權力之大，一至於此。因此，雖在國難期間，益顯其重要性。爰特網羅領袖之有關教育言論，分類編定，綜考闡明，而於實踐方法，益加充其具體周詳，俾讀者得依以實際遵行，庶領袖遺教，不致中斷，且其共同達成「教育救國」之目的，是乃著者之所厚望也。惟以才薄識淺，誤解之處，或不勝枚舉。但救國教育思想之宏偉，鑒殷鑒切，針對時艱，故不自揣其拙，而略陳其陋，非敢謂有功，欲藉以拋磚引玉也。二十八年冬陸克 自序於重慶教育訓練室。

目次

一、引言

..... 一

二、領袖與教育

..... 一

三、教育與教育

..... 九

四、教育與教育

..... 一五

人類生活

教育與教育

..... 三九

的革命的唯——領袖，它與——
物，所有廣義的領袖，都應受他

引

言

第 二 章 教育發展其方法

領袖的救國教育思想及其方法

四

凡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等，均有深刻的研究和澈底的瞭解。所謂「一通百通」是也。所以他能夠做各界的領袖，而形成为中国唯一的領袖。這裏稱領袖為一個教育家，並非空口說白話，而有實際的事實可以證明：

一、領袖的教育與領袖的教育修養。我們對於時代中心人物的觀察，不但明瞭其事業之所以偉大，還要明瞭其平時思想與學術的修養。而此種思想與學術的修養之所以養成，又與家庭教育有極大的關係。領袖幼年時代，即受了良好家庭教育之陶冶，教育與修養有相輔相成之關係。領袖的先代大多務農，到其祖父玉表公時，則已轉為士族。玉表公的經濟就漸漸充裕起來，玉表公又是一位樂善好施的長者，他對於貧苦的人，常予接濟。對於地方之公益，如修路、築橋、興學、賑濟等，無不竭力贊助。玉表公又通醫理，常為人診治，他對於研究儒學，因此發揮其仁慈博愛的精神，以濟人度世。領袖幼年多病，玉表公常為其診治，極其多誼，因此領袖對於玉表公的印象很深，而玉表公對於治家嚴、待人厚、好公益盡力的美德，影響領袖後來的教育上的修養確實不少。領袖的父親顯慶公，性格剛直，辦事公正，待人體貼，且持勤儉，在鄉里間好排難解紛，主持公道，對於公益極其盡力，故領袖自幼受其影響，凡求學者多予以接濟，因此造就的人才很多。其對於家庭教育之修養，曾對領袖的兒們說：「我因少年時承繼了先人

的遺業，不能爲國盡力，但我還想對於社會公益和教育，改良風俗方面，盡相當力量，使地方安寧，親戚和睦，你們可以安心讀書，將來如果有所成就，也可以彌補我的缺憾。這番話聽來，對於領袖後來求學與辦事方面的努力，關係固然很大；而對於領袖的教養上的修養，影響更復不小。領袖不僅深受其祖父與父親的教訓，即受其母王太夫人的教訓影響也很大。領袖三歲喪父，故王太夫人以一身而兼父母之責，訓子不倦，有違犯時，並痛加責懲。領袖於民國五年，曾題贈「教子有方」一橫額以褒美之，由此可以想見其世教之優良，自不無影響於領袖的教育上的修養。領袖自幼年迄壯年，歷受其祖父與父母的優良教育，不但促進其今日其大事業之成就，更能使他在實際社會教育中，得到了不少的寶貴的教人方法，所以領袖的家庭，不啻是一個師範學校，領袖的家庭，也正是優良的師範，領袖經過了上述的陶冶與學習，當然會教人會辦教育事業，所以我說領袖對於教育富有研究，於實際教育與陶冶有關，亦非虛語也。

二、領袖本身有種教育事業的豐富經驗。大凡一個教育家，他不僅有他的教育理論，還須有實際從事教育的經驗，從實際經驗中所產生出來的教育理論，才是一種正當的教育理論。中國的舊式教育，已經歷了數十年，所以不能收其教育效果的原因，就是因爲一般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都還是根據着舊式經驗的標準。出此的。不是憑着一己的想見；就是模仿外國；以致教育不能適合國情，不能適應國家民族的需要，已爲一般人所詬病。領袖的教育

領袖的救國教育思想及其方法

六

理論，多半是從他的教育事業經驗中得來的，所以沒有不能辦的，沒有不能辦的成效，實在是值得吾人研究的。細考領袖的教育或革命事業的成就，實由於其對於教育方法所得來的；而且其對於教育偉大的貢獻，不僅在於教育，且其教育以爲政治或革命事業推進之助力。在他負責領導中國革命進程時，他並親自負責與辦了許多革命軍事教育，尤其他創辦了許多革命的基本武官教育，是值得我們稱頌的。民國十三年繼承總理之命在廣東創辦了黃埔軍官學校，從那裏起到現在止，從黃埔軍官學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以及其他各種訓練班及特別隊，共一手所造就出來的軍官，已達二萬餘人，幾乎遍佈全國各地。此外如軍事官學校以外，近年來又兼長中央各級軍事官學校，軍官步、騎、工、輜專校及中央政治學校等，他在十餘年內，爲了教育青年，奠定了中國革命之基礎。中華民國之所以敢大膽與日寇作戰，其所以敢大膽與蔣介石作戰，其所以敢大膽與後盾。領袖又曾任教育部部長，總管全國各級教育一舉，其貢獻至巨，其與最下層之國民基礎教育接觸，所以他的教育事業，不僅在軍事，不令他平時對於教育工作的研究，實足以爲教育事業的興辦而，已足見其能擔任一國教育家的名義而無愧了。

三、領袖自己願以教育界自居。領袖本名爲孫家驊，教育之淵藪，又復具有辦理教育事業的實際經驗，所以其不但在教育方法上有他自己的武裝與辦法；而且他的主張和辦法，都是最適合於中國特殊國情，不是一抄襲或仿效者，所以可比較的。因爲他

的教育思想，並不純是他腦筋中思想的產物，而是探溯中國的歷史，根據中國的國情，加他自己的豐富經驗，積累研究和體悟得來的。在他革命事業的成功，固然有賴於他的軍事天才；實際上，就是領導於應用他的教育天才。他對於教育事業，饒有研究者之。培植革命基幹，以促一革命事業之成就。他的革命事業的成功，可以說是他的教育事業的成就，自這成就教育事業中所得來的教育經驗，自這經驗中可寶貴的；實施起來，當然也是萬無一失的。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十月間，到武漢教育界訓話的時候，曾說說：「中正現在雖然在帶兵，但教育在武漢的學校，頗具教育界領袖之地位在。一創辦實小學校。現在在武漢辦理。治學與軍事學校」（註二）。自上述這話；我們可知他領袖於教育關係富有研究，而且富有興趣；否則，他何以以一教育界口首居之？教育界。一在武漢教育界，為最苦者。既在苦界中奮鬥，又不肯在苦界中休息，他居這一級看待，而以教育界為最苦，更可想見其平時對於教育的重視與研究了。可以凡是中國之國民，尤其是各方面負責教育責任的人，應當認識接受領袖的教育主張與方法，在領袖的領導之下，通力合作，切實奉行，以圖中華民族之復興。

四、贊揚領袖富於教育研究的一般言論 領袖對於教育富有研究，不僅有事業足以證明，不僅他自已公開承認，而且先施之加以讚揚。言論也很多。當領袖長南京陸軍軍官學校的時候，曾說過：「教育界之領袖，當以學生為：一校長是善於培育的人。培是培

權，育是教育，他是善于培養教育人才。本校自第一期四百多學生發展到現在這個良好的階段，便是校長善於培育的結果。而且本報能夠完成現今的版面，全賴本校力量來做革命武力的中堅。所以本校能以成功，也是由于校長善於培育。校長對於自己的學生，自己的部下，都有培育的善法，官長有不尊敬請，在校長督率之下，便能勇敢起來；學生有浪一的，驕傲的、懶散的，在校長訓練之下，便一變而不敢浪，不驕而且用功的良好學生。前幾年有些學生犯了浪、驕傲、毛病，一經校長注意矯正，一氣定而一變；現在講到浪漫驕傲的學生，就算是很少了。他以前做來教育，他學生不敢浪，不敢有一切不好的態度。他以前學期的成績，他以前對於我們注意和佩服的」(註三)。

這是講揚揚教育方針的善法，幾近於一個教育界所及的地方，無往而不奏教育的功效了。前任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先生他「著將先生之教育思想」一文中，曾經說到：「蔣先生近曾手訂各種教育基本要領，於嚴格訓練與精神訓練二者特詳。蓋深知過去教育之缺點所在，即思為有效之矯正，以期增進全部教育之功能」。又說：「嚴格訓練與精神訓練之注重，為中國教育之新動向，所倡導最力者為蔣先生。此種訓練，在給予全國青年以健康的身體與健康的心理，其導至健康亦至顯。然曾先生有言：「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教育之興替，民族之盛衰，亦何獨不然！蔣先生倡導教育改革，迄今才三數年，而風氣已丕然大變，從知曾先生之言，深刻而可感也」。(註四)這是稱道領袖對於

中國教育的建設與革新，並能使中國的教育向着正常的途徑邁進。此外關於贊揚領袖當于教育究竟的言論，遍讀各書報雜誌，恐為篇幅所限，未便盡量採錄。總之：各人如此讚揚領袖，決非「言口雌黃」，自然各人有各人獨到的見地，才敢發出各人的言論來，則「領袖當于教育究研」的這句話，已經得到大多數的公允了。

總上以觀：我國領袖幼年時代，從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中即體會到教人的方法；壯年以後，繼續不斷的自辦教育事業；又從他辦教育的經驗中來決定中國所需要的根本教育。在他試行自己教育主張而獲得圓滿結果以後，更老實不客氣的以「教育界」自居，同時國內先進亦站在客觀地位而獻上一個「教育家」的頭銜。因此：領袖之為教育界領袖，事實上已無疑義，更為任何教育人員所不能否認的了。現在國勢岌岌，尤盼我國教育界同人，竭誠擁護領袖的教育主張，互相研討領袖的教育學術，並在領袖的實際領導之下，發揮教育的效能；充實國家的元氣；增長民族的生機；以制止暴寇的侵略，而圖謀民族的復興；並建設永久的精神的鞏固國防。

三 教育與救國

教育之所以傳遞民族文化，延續國家生命，不容割斷的。一個民族或國家，如果沒有教育設施，或設施教育而不適當；那麼這個民族或國家，勢必漸趨衰邁，而終至于滅亡。

試觀歐洲各弱小民族，教育事業不發達，人民知識水準低下，以至瑞士四分五裂，均成了歐洲人的殖民地。反之，歐洲民族國家，大都教育普及，人民知識大開，國家觀念增強，各項事業，亦因此愈趨完善，故能征服非洲民族，而擴展其國家領土與主權。暴虐的日本之所以能在我國意志者，亦因其教育程度高於我國也。我國實無新教育，雖有數十年之久，然而教育不能適合國情，以致影響教育事業之發展，而收不到教育之功效。在物質方面，因為科學不發達，所以沒有國防武器來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炮，在精神方面，因為人民知識不開，所以觀念淡薄，所以任敵人欺侮、宰割、誘騙，而造成今日半死半生之局面。領袖早已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對於教育事業，極力提倡，「現代國家之生命，在於教育、經濟、武力三要素相構成。我們現在所有一切的努力，都要歸到一個共同的總目標，就是在推動政治，建設國防，培養國家之生命，以完成全民族總動員的準備。」；教育差不多是一切事業的根本，而與經濟武力的連繫關係，尤為密切，必須互相聯絡，互相連貫。亦可以說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連繫的總樞紐，所以更須以發達經濟增強武力為教育的方針，而施行國民教育才算真正的「國教育」(註五)。於此，可知領袖教育為抗戰與建國之基本工具，要第一必須發達，第二建國必成，第三民族教育不可不發達。領袖視教育為國家生命之一，且為武力與經濟之本要素。因民族文化之高低，為民族強弱之基本原因，而民族文化之高低又決定於教育，故教育為建國之本。這是領袖的

敘述，若分析言之，他認爲教育更有下列諸種意義：

一、教育爲立國之基礎。領袖認爲教育是立國之基，無教育則無國家。他曾經說：「教育爲立國之基礎，訓政時期之教育，其的增進與質的改善，應同時並進」（註六）。蓋訓政時期的工作很多，千頭萬緒，應帶處理，舉凡尊重法治，發展民主，培養民族毅力，完成地方自治等，皆爲重要任務，然而教育仍不失其爲中心工作之一。

二、教育爲革命之基礎。領袖認爲教育是革命的發動力，要思革命成功，必有好的教育以補助之。所以他說：「誰也知革命之基礎是教育，如無教育，則革命必失敗，革命一定不會得到美滿的效果，一許這會發覺很大的危險」（註六）。教育與革命，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領袖所以能使中國革命取得成就，實有賴於教育之功也。

三、教育爲救國之基礎。領袖認爲教育是救國的唯一途徑，同時，教育和經濟看得一樣重要。他說：「我們救國第一要素是經濟，第二個是國家要素，不是陸軍而是文化教育，我們中國近來實在沒有注重這兩層，僅僅是注重到軍隊和其他的物質，而且沒有步驟，沒有整理，所以沒有得到救國的要點，最重要的救國方法沒有注意到。所以現在我們要救國，要興民族，比一切都重要的東西，第一個就是經濟，要地方與國家經濟都能充實。第二個就是教育，如果教育不能發展，必有進步，那末，文化就要衰敗。如比沒有文化的民族，國家一定要被滅亡，民族也不能夠存在」（註八）。領袖不僅把教育和經濟同

樣看，似乎進一步應認爲教育力量之大，大過任何力量。他接着又說：「教育不能夠發達進步的時候，那末，無論我們國家多少軍隊，物質無論怎樣豐富，國家也一定會要滅亡的，不能存在」（註九）。所以「教育爲救國之基礎」這句話，仍然是他一貫的政治主張。

四、教育爲復興之基礎。領袖認爲中華民族要想復興，首先要發展教育，他說：「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要復興或改良進步，方法很多，但旁的方法很不容易見效；改造國家與改造社會，惟教育之效爲最大」。又說：「現在這個危急的局面，如何挽救，整個的國家社會如何改造，這當然是革命黨和政府的責任。不過要一個國家改造好，要政府和黨能夠有力量，達到實現主義的目的，最緊要的還是要教育界共同努力，以教育來救國」（註十）。我國現在差不多算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復興之道，教育爲首，全國教育界同人，苟能負起責任來幹，那末一定可以到達復興的境地。

五、教育爲抗戰建國之基礎。領袖認爲不論是抗戰或建國的時候，教育在國家都是佔着極重要的位置。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團員說：「各位要知道：我們革命要成功，國家要建立起來，一定要由你們校長教職員負起根本重大的責任，尤其在現在我們要消滅敵人，擊退敵人，格外要由你們擔任教師的切實負起責任。」（註十一）他不但是這樣的竭誠勸告，還舉出德國所以能打敗法國；日寇所以能打敗帝俄以爲實例，亦可想見領袖在

此種戰建新期中，對於教育之重視了。

六、教育爲一切事業之基礎。領袖認爲教育是各項事業之基礎，不論平時或戰時總是需要的。要想創造新社會，建立新國家，無不教育力量便不能「如願以償」，或致「事與願違」。所以他對江西黨化教育講習所的學員說：「中國國民的知識，革命責任的担負，以及一切的建設事業，無一不是以教育做基礎。能夠在教育方面爲一種新奇的努力，五年後必可造成一個嶄新的江西，革命的江西，不是人力可製造的，不是兵力可打得的，不是金錢可買來的；革命的江西，純靠小學教師去努力建設。黨化教育講習員的責任，比任何同志都要大」（註十二）。這是專指江西一省而言，如果擴大範圍來說：要想剷去中國一切的阻礙，造成一個嶄新的國家，亦何獨不然！

總上以觀：領袖認爲教育與國家，二者不可分離。國家如果沒有教育，則國家便不能存在。反過來說：一個國家，如果能認真辦理教育事業，便可「救亡國危」，「起死回生」；「轉弱爲強」；最後是奠定鞏固的邦基，永遠獨立生存於世界，所以教育是國家的生命，國家是教育的產物。而教育上的一切實施，須以國家的需要爲出發點；教育的本身，不能自有目的；應以國家的政治之目的爲目的。現在中國政治之目的，是以「救國」「愛國」「建國」「強國」爲前提，故教育亦應以此爲前提。領袖在廿四年五月對雲南省會中以上學校員生訓話說：「國家和民族便是我們最實際最重要的『大我』，我們個人這一個『小

我」，必須仰賴國家民族的扶持救養，然後才有生存發展之可能。亦惟有求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能漸進步和發展，然後個人才能得到真正的進步和發展。所以惟有將我們個人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然後我們的生命才能發揮最大效用。我們要認識，現在大家在學校裏受最好的教育，這些國家為他們所設備的。所以從國家或民族方面來講，我們做人講道理，就是：既做了人便要做一個良好的國民，便要盡忠於國家，盡犧牲個人來報效國家和民族，以盡到國民的責任。我們現在所學的，就是這個為國犧牲的基本道理和如何發揮犧牲的效力之一切學問。就教的方面來講，我們教學的目的，第一步自然是要教他在天地之間做一個真正的人，第二步成爲中華民國一個良好的國民，能列愛護國家，盡忠於國家，具體的講，就是要使個個學生有濃厚的國家觀念和深刻的民族意識，絕對不是外國人，絕對不會做洋奴，充漢奸；並且能積極犧牲一己來愛國家保民族」（註十三）。領袖視教育爲救國的利器，學生讀書爲的救國，先生教書也爲的救國。汪世傑先生對於領袖教育言論的觀感是：「他於空裏行間，深切的流露着國家民族的概念，視教育爲愛國家愛民族之重要的方法」（註十四）。這話誠然不錯！中國現在國勢衰危，民族懦弱，大家亟須遵循領袖的提示，毫不猶疑的去埋頭苦幹，我想一定會收到預定的效果。陳劍恆先生說：「教育雖不是萬能的，但在政治的指揮之下，確是一件鋒利的工具！」（註十五）。我願我全國教育界的同志，在這位政治家軍事家兼教育家的 蔣先生領導之下，去善用這鋒利的工

四 救國的教育

領袖認為教育是救國的唯一工具，教育不能得到適當的發展，正是國家亡亡的象徵。中國所以弄到現在這種地步，推本溯源，都要歸罪於教育。他對於中國的教育，一向就不滿意：學生爲了升官發財來讀書，先生爲了解錢在活來教書，大家對於國事漠不關心，長此以往，第一代學生變成了第二代先生，依然不敢傳統的思想；代代相承，毫不覺悟，所以弄到國事無人問，國難無人救，而予外人以可乘之機。記得是民國十六年（？）吧，他在江西黨化教育講習所講演，講到中國的教育，他極痛憤的說：「諸位要知道過去的教育，是極其腐敗的教育，是奴隸的教育，現在要懸崖勒馬，改弦更張，要訓練兒童成真正的國民，忠實的國民黨員，與愛國誠的革命軍人」（註十六）。民國十九年，他在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席上又說：「我們試一看到我們中國教育最近的狀況，實在是悲觀的。所以現在各省負有教育責任的各位先生們，要切實負起責任來，使現在教育上的毛病完全革除，並領導青年們走上真正的革命大道，羣集在三民主義革命的旗幟之下，努力國民革命」（註十七）。民國二十一年，他參加長沙黨軍擴大紀念週又說：「我們湖南的教育，還沒有詳細考察。但是從各省教育考察的結果，可說都不是興國救國的教育，而是亡國

的教育。中國東三省之所以給日本侵略，國民革命所以弄到這樣危急存亡，原因雖有甚多，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即是教育之不注重。我說現在的一般教育，既不是革命救國的教育，也不是復興民族的教育，完全是亡國的教育（註十八）。民國二十二年，他在奉化溪口武校學校講演，又說：「近年學風一日壞如一日，什麼罷課反對教員以及一切不正當的行為，學生都竟做到，平常在學校，一點不知用功，對師長不知敬重，對父母亦不孝順；這樣的教育辦下去，所以要被日本人來欺侮」（註十九）。民國二十三年，他在南昌對省會中學校長學生講話，又說：「一般學生畢業出來，不知為社會國家來服務，只知道自私自利，要求升官發財，只知求一身一家的溫飽，不知道此外更有救人濟世的義務和高尚大的事業。因此國家和社會，一天一天要墮落衰頹，到現在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快要遭受亡國滅種的惡果。這個責任應該由誰負呢？從根本上講起來，就是由於過去的教育不良，教出一般祇知自私自利，不和為學的目的，不盡國民的本分的人，因此社會國家的事再沒有人管，既無人管，當然要一天天敗壞下來」（註二十）。民國二十四年，他在成都四川大學講演，又說：「現在一般人以為社會風氣之所以腐敗，民衆之所以如此痛苦，是由於軍隊不良因而厭惡軍人，但這也不過是重要原因之一，並且還可以說並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一般負教育責任的人和一般學生以及社會上所有的知識份子，沒有盡到領導民衆改造社會的責任，自己沒有志氣，不盡責任，而徒然責備軍人，這是

不應讓他人（註二十一）。民國二十七年，教育中次訓練應屬第一難題。說：「我們中國近幾十年來倡行所謂『新教育』，在表面上似乎是理論方法，應有盡有，實際上這種新教育祇是盲從、粉飾、凌亂、空泛、無計畫、無目的的的教育，教出來的一般學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樣做人，也沒有立志要做怎樣一種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所以有許多學生什麼事情都不能做，生在世界，於社會於國家於他個人，都毫無益處，其結果，使我們國家民族到今天要受敵人無止境的侵略，蒙受現在這樣奇重的恥辱！老實說一句，最近這二十七年的教育，幾乎都是糊塗的教育，其影響所及，不僅足以亡國，而且將致滅種？」（註二十二）。我們拜讀前年來的言論，便知道他對於教育現狀極爲不滿，遠自北京同文館（一八六二年）以來的七十餘年教育，近則民國成立以來的二十七年的教育，都是些「腐敗的教育」、「奴隸的教育」、「亡國的教育」、「糊塗的教育」、「盲從、粉飾、凌亂、空泛、無計畫、無目的的的教育」；而不是「救國興國的教育」，「革命建國的教育」；「復興民族的教育」；教育者毫無目的，敷衍塞責；受教者盲目相從，祇求進業；社會因此而衰頹，國家亦因此而危矣。古諺有云：「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國不自振奮，萬事落後，無怪乎敵人長驅直入，到處逞兇肆虐也。領袖又指示我們：「不良的教育，其影響所及，不僅足以亡國，而且將致滅種」！吾人極宜趁此國未亡，種未滅的時候，及早推行救國的教育，使舉國上下，具備救

國知能，以驅除倭寇，而奠定邦基。

領袖是一個「英明果斷」的人，何謂「英明果斷」？「英明」就是能看清事理，「果斷」就是在看清事理之後，馬上就能決定。他看到中國教育的弱點，是不能以救國為前提，所以他大聲疾呼，領導國人推行救國教育，並告訴我輩教育界同人說：「我們教育界各位同志，格外要注意到中國固有立國的精神禮義廉恥，如果教學生僅教他在黑板上書本上，而不能使學生明白做人的道理，對於國家的責任，和挽救國家危亡的道理，那末，現在的教育等於零，何能得理事半功倍。如果現在的教育能從我們最高的文化禮義廉恥着手，使一般學生知道做人的道理，愛國家的道理，愛國家的道理；對國家民族所負的責任；然後再教其他一切學問，那種學問纔有實用，纔能救國。所以我們要救國，就要使一般國民知道禮義廉恥，尤其是我們教育界，在一般青年中，格外要使得他們知禮義廉恥；是救國的法寶。我相信這一點如能做到，那末，我們國家就隨便什麼時候都可復興，失去的土地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收復」（註二十三）。他不僅告誡教育界同人，凡屬智識份子，都要負起救國教育的責任，切實推行，始克奏效。他說：「今後我們建設國家復興民族，除發展教育外，再沒有旁的根本方法。所以教育乃一嚮至萬無上的救國復興的根本事業；凡是有志救國，要復興民族的人都要致力於此。即如第一級直接負有教育責任的教職員或教育行政人員，應盡其責任，切實推行，始克奏效。其次應注意於社會教育，應使一般國民，在社會教育中，負起其責任，切實推行，始克奏效。再次應注意於家庭教育，應使一般國民，在家庭教育中，負起其責任，切實推行，始克奏效。最後應注意於職業教育，應使一般國民，在職業教育中，負起其責任，切實推行，始克奏效。」

負起這個教育的責任，人人要以身作則的教導，務使一般國民的衣食住行，統統能合乎禮義廉恥，如此，我們社會才容易進步，國家和民族才可以復興！」（註二十四）。由此我們可知知道：救國教育推行的方式，是要智識份子總動員，個個負責教導；個個以身作則，使教育力量得到廣泛的發展。至於救國教育的要義，就是以我國有民族精神——禮義廉恥為最高原則；使人民生活上——衣食住行均能合乎禮義廉恥，彼此互相連貫，打成一片，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是謂救國教育之實現，而中華民族復興之基礎，亦即奠定於此。為何領袖要以禮義廉恥為救國教育之高原則呢？因為他感到今日我國社會，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發現於行為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故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放蕩昏庸，富者則繁瑣浮華，貧者則卑污混亂，其結果遂使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能抗，人禍不能弭，內憂外患，外侮頻仍，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若此而不變，則雖欲苟延其鄙野的非人的生活亦不可得，故欲保障我國家之存生，延續我民族之生命，發展我國民之生計，非提倡「禮義廉恥」的救國教育不可。他並重地告誡國人說：「禮義廉恥者，乃發民德以成民事，為待人，處事，待躬，接物之中心標準；違反此標準者，無論其個人，國家與民族，若若不為之設止者，則亡國不遠矣。」（註二十五）。其重要性由此可見。其語叫作「禮義廉恥」，就是規規矩矩的態度；

什麼叫做「義」？就是正正當當的行爲；什麼叫做「廉」？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別；什麼叫做「恥」？就是切切實實的覺悟；「禮義廉恥」爲古今立國之常經，依時間與空間之不同，自各有其新的定義，這裏是就吾人應用於今日之待人、處事、接物與持躬之間的一種簡要解釋。若要看到詳細解釋，請讀領袖親訂的新生活運動綱要，他對於「禮義廉恥」的解釋如后：

「禮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謂之定律；理之在社會中者，謂之規律；理之在國家者，謂之紀律；人之行爲，能以此三律爲準繩，謂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爲的表現，謂之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正當行爲，依乎禮即合於自然定律，社會規律，與國家紀律者，謂之正當行爲；行而不正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皆不得謂之義。

廉者，明也；能辨別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爲是，反乎禮義爲非，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謂之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己之行爲，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羞；人之行爲，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惡；惟羞惡之心，恆有過與不及之弊；故覺悟要在切實，有切實之差，必力圖上進；有切實之惡，必力行消雪；此謂之切切實實的覺悟。

我們得了領袖的指示，便得自導其行爲的動機，廉是行爲的標準，義是行爲的履踐，禮是行爲的表現，禮者相連貫。至於恥，明於廉，行於義，而形之於禮，相需相成，缺一不可。人之生活與衣食住行，而衣、食、行三者，又可分爲資源之獲得，品質之選擇，與方式之應用的三方面，而能此三方面合乎禮義廉恥，即資源之獲得合乎廉，品質之選擇合乎義，方式之應用合乎禮，三方面有一方面失禮，亡義；或不廉之事發生；即認爲生活之汚濁，而引致腐敗，至於生活行動上方面改正，以盡量使生活與禮義廉恥打成一片爲最高原則，如此則腐敗的在生活發生作用，則其生活自然趨向於進步的現代的自強的路徑；掃除其汚濁的腐敗的惡習，以培養民族的生機，樹一國家的正氣，而達到「驅除倭寇」「光復山河」「民族復興」的目的，負此重大使命者，其惟領袖的「救國教育」是賴也。

領袖對於哲理具有深刻研究，他的救國教育思想，在他的人生哲學上亦有相當的根據，他常把他的人生哲學，這樣的指示他的部下說：「總理常講：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離的。總理還把精神的意義，解釋得極明白：他說：『凡不是物質的東西，統統叫精神』。從古至今，沒有人能下精神的定義，像總理這樣確切。所以，我們要承認宇宙間除了物質之外，還有一個精神的東西存在。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小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有良知要能致，即是行；即所謂實現良知；亦即是『知難行易』的實行

者。如此，所謂良知，才不會於茫茫，才不會做一箇空，所謂心證者，同時也不會做一個機械的唯物論者。所以我對教育者的態度，不，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道」字，才去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為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為唯一的人生哲學。（註二十六）。

他很強這種「行的哲學」，發明教育救國的道理。他以為教育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要想達到人生目的，非專負其「一人」，而非經過社會各個階級不可。人生的目的何在呢？在他所前定的那個對聯上，便可以明自他的「生命」，所謂「生命」是：「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下聯是：「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兩句話，不是憑空杜撰，是根據深奧的哲理而來的：上聯是解釋人生生活應重視「大我」而忽視「小我」，「小我」本包含在「大我」之中，要「大我」發展，「小我」才有發展的機會，並且發展了「大我」便是發展了「小我」。民國二十年一月五日，他在中央軍校紀念週講演，對此曾加以淺近的解釋：「現在同胞沒有穿沒有吃的人太多了，我們無論作學生，作下級幹部，或高級長官，總要想到，除了我個人之外，對於一切人民同學同志朋友，都要使得他們一樣的有利益處，不祇我們自己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便算了」（註二十七）。我們要增進人羣之幸福，須先從最切要之點做起，凡得救救助之千百萬同胞的生命，即為我的生命之擴大，而我一小己之生活，乃與千百萬人之生活相合。歷史上許多

賢哲之所以建豐功偉業，其動機不外如此而已。下聯是解釋人的生命是繼續不斷向宇宙「大我」發展的。生命的意義若限於「小我」，則生命便可以死，可以死滅的生命不能稱為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創造的，創造什麼？創造宇宙間繼起的生命。他在中央軍校紀念週席上，對此亦曾同時加以淺近的解釋：「隨便那一個入，活到一百歲也是要死的，早一點死，遲一點死，都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了』之後，我們的歷史生命，要能繼續下去才好，決不是我們的身體死了，生命就完了，我們生命的意義，不是那樣的，比如我們總理逝世，今年已六年了，但是我們總理的生命沒有完的，並且永遠是可以遺傳下去的。我們軍校的學生已死了幾十人了，但是軍校學生已完的生命，並沒有斷絕，因為中國國民黨存在，國民政府存在，軍官學校存在，軍官學校的學生也還有存在，他們的精神永遠不會消滅。大家不要以為我個人既然死了，生命即已斷絕，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比方我們總理死了，有我們一般學生來繼續總理的生命；我們一般同學死了，從新又有一般同學同志來繼續我們的生命。因為我們的生命的意義，是在創造其繼續的生命，不是說我們出生到死為止就算了，我們的生命自己天天仍在創造的。生命是可以創造的，不是生死可以限制，限制却在於我們自己，如果只圖自私自利，那生命到死便完了，若是實行三民主義，求民族獨立，謀黨務發展，我們的生命就是永遠不會斷絕的」。（註二十八）我們讀此訓示，當可糾正一般對於生命之狹窄見解而表明生命之真義。一般人對於

「生」的意義，有不同的認識；故「死」的意義亦有不同的認識。人常以為「死」即人之終了，而不知死後尚有精神之存在，實真如此，則人之一生，誠屬可憐，蓋悠悠天地，吾人所享者僅此一段短促的生涯，豈不大可哀耶？故吾人若從生命是「創造的」觀之，則此悲觀之黑暗頓然打破，而現出偉大的光明；若生命是不可限量之無窮延續。總之：領袖認為「為生活與生命，應忽視『小我』而重視『大我』」。就宇宙而論；個人應發揮其在宇宙間的意義與價值，勿忝為人類。就國家而論；個人應盡其好的國民義務，犧牲其個人利益，以謀國家民族之幸福。就社會而論；個人應盡其合作、協力互助，為社會勞動服務，以謀羣衆之幸福。故吾人應以「實國強種」為前途，以增進吾人生活，創造吾人生命；則民族自能延續，國家亦可生存；進而達到「世界大同」之地步。況中國社會之組織，又具有適之此種特殊之特性；則我國當有能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歐美工業社會忽出家之組織）之關係，尤為密切，而治國必先治其身，身修而後國治之理，則一也。大學一書之備述治理之道，本末，歷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程次，洵為中外政治學、社會學上至偉大發現（註二十九）。故領袖以糾正個人生活與生命之觀念，以為目前救國教育之起點，不但在哲理上有深切的根據，而且此種教育應用於實際上，以為救國教育之原理；則尤能適合中國之國情也。所以領袖的救國教育思想和主張，並非目擊中國國勢，便發明救國教育；他日國

國強，無須挽救，便沒有救國教育的提倡，果國如此；那更是一種「頭帶爛頭，脚痛顧脚」的教育，根本失掉「教育為國家百年大計」的意義。他的救國教育產生之背景，是根據「國現實環境之需要」；他的救國教育思想之泉源，是根據他「人生哲學與革命哲學」的；現在可以稱為「救國教育」，將來可以稱為「建國教育」，再將來可以稱為有教無類的「世界大同教育」。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時間彌遠，功效益著，決不像日本德意美滿大利等國的「救國教育」，專門教育「國人」以圖自強，而未顧及其他別種民族與國家的福利，則有天壤之差別矣。

領袖的教育哲學及救國教育要義，既經吾人明瞭之後，吾人即須根據此點，以確定受教育者的人生觀，更進一步確定受教育者的志向。他以為中國新教育辦了數十年，其所以無結果者，即不能事先立定教育目的之故也。教育者既無目的，受教者亦不立志，換句話說：就是先生不知為什麼要教？學生不知為什麼要學？彼此互相敷衍，互相蒙蔽，以致功敗名裂，劣蹟屢現。所以他以為救國教育沒有實施以前，先要確定教育目標，有了目標便為努力的方向。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團員說：「我們教育最要緊的是要有目的，各位從事教育，首先要問我們教育要教些什麼？受教育的人所必須學的是什麼？我們教出來給學生要使他們成爲怎樣一種人？能擔任怎樣一種事業？這是我們教育家在辦教育以前，人人要確定的最要緊的根本方針。如果事先沒有一個確定的方針，我們教育人便沒有目

的，教出來的學生究竟做怎樣一種人，做怎樣一種事，都沒有目標，這就是無目的的教育，是害人害國的教育」（註三十）。他最痛恨現在一般「職員，只知教，不知育，所以受了教育的學生，浪漫放肆，糊裏糊塗，幾不成其為人，又那裏談到救國！他常說：「：尤其不注意到學生明白求學是做什么用？為個人的，為國家的，還是為社會的，為民族的。我們要曉得求學以前，先要立定志向，如果沒有志向，就是方針不定，無論學得怎樣好，是無用的」（註三十一）。他又說：「我們一般為人師長的，對學生一定負一種最要緊的責任，學生進到學校裏來，受我們的教育的時候，一定首先要告訴他為學的目的何在？同時，我們每個學生，自己進到學校是來念書，一定首先要問先生，我們為學的目的何在？我們要立何等志向才好？如果學生不如此自問，先生不如此解答，那就是先生沒有盡到先生的責任，學生也不成爲學生！」（註三十二）。領袖又說：「學生要確立教育目的」，「學生要立定求學志向」；就是古人所謂「學先立志」或「士志」的意思。蓋「一生事業，定於發削之初」，教育若無目的，學生即無一定方針，今日就學，明日畢業，不管國家，不管社會，不管民族，只管自私自利，自溫自飽，其於國家社會民族非徒無益，反而有害，豈不痛哉！現在國勢日殆，亡在旦夕，欲民族復興，力圖自強，其有賴於教育者至夥。教育目的，領袖已明白指示全國教育界說：「我們現在要挽救國家，復興民族，首先就要打破過去亡國滅種的教育，來實行抗戰建國的教育。我們的教育一定要能達到抗

戰建國的目標，才是現代中國所需要的真正的教育」（註三十三）。這是教育目的，凡我教育同人，尤須極力奉行，以資加強建國的基礎。還有教育青年，要立定什麼志向去受教育，才不辜負國家的期望呢？領袖對於學生應立的志向，亦曾明白的指示，他說：「立什麼志呢？……古語所講的『興滅國，繼絕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我們必先立定這種偉大的志願，找到這個人生的正鵠，然後才知道我們所學的是什麼，與為學的目的之所在」（註三十四）。果能如領袖所言：教師辦教育的目的，和學生求學的志向，彼此混為一流，均以「國家民族」為中心，「抗戰建國」為前提，則我國教育，自不難收救國之效。

根據領袖所指示的教育目的，究竟應該如何實施？始能使目的實現。關於此項問題，領袖在各機關各學校演講常說到。惟以上作業繁多，無暇全盤托出，僅按各地各人所需，斟酌情形提示，並即完整的實施方案，其要點如下。作者有感及此，時將領袖平時指示吾人的救國教育基本原則與實施方法，作一綜合的系統的歸納於后，俾國人得知其梗概焉。

一 基本原則：

（一）中國化 所謂「中國化」，就是教育要適合國情；縱然要接受東西洋的優點，也必須把那優點溶合於我國的實際國情中，絕對避免硬搬硬套式的教育。領袖以為我國教育沒有顧到本國國情，所教出來的學生，有許多儘管名目上是中國人，而一考其思想與精神，就沒有有一些中國人的氣質，這些人既不明瞭本國的歷史文化，和民族地位的重要；

也不尊重本國固有的道德，和立國的特性；更不知道做一個國民應對本國負有何種責任，只是盲目的接受外國的一切，凡本國的都可以隨便吐棄，毫不顧及，凡是外來的似乎都可以隨便模仿，不加別擇，而且只講表面，徒襲皮毛，浮動淺薄，隨人俯仰，完全喪失獨立國家的精神。這種人本不知有國，又那裏知道救國，這種教育正如領袖所謂「不是救國教育，而是亡國教育」是也。我們要實施救國教育，首先要使教育中國化，領袖指示我們說：「中國國民必須要有中國人所固有的品格德性和精神，才可以算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換句話說，中國人不僅要以『中國』為他的生命，而且要以『中國』為他的靈魂」（註三十五）。教育果能中國化，則所教出來的學生必能做一個真正中國國民，並應用中國固有之知能，以為其「自衛衛國」的工具，此為領袖的救國教育基本原則之一。

（二）主義化 總理的遺教告訴了我們：主義是一種信仰，我們沒有主義就沒有信仰，沒有信仰就沒有力量。我們在這個民族抗戰的艱苦奮鬥過程中，沒有主義的信仰是不能担起這偉大之任務的。所以我們救國的教育，也必須站在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下，力求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領袖曾指示我們說：「各界諸君，要國家能夠健全，能夠獨立自由，第一步工作要謀中國人思想統一，要確定 總理的三民主義，為中國的唯一思想，再不好有第二個思想，來擾亂中國」（註三十六）。又說：「盼望諸位教職員大家努力工作，接受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的精神，灌輸給青年學生們，……」

(註三十七)。我們的教育是民主化(即領袖所提倡的「黨化教育」)則不難驅除殘暴的倭寇，建立嶄新的國家，以促進世界大同；此種領袖的教育是教育基本原則之二。

(三)政治化 教育與政治本是一件分不開的東西。教育要政治為背景，政治要以教育為工具，使教育上所造出來的人才，是夠政治上的使用，換句話說就是推行「政治教育」。領袖對於「政治教育」之實施，非常重視，他以為教育本身不能育目的，應以教育之目的為目的，教育好像政治的種子，需要時可以任政府賜給去。現在中國政府之目的，是以「救國」為前提；故教育亦應以此為前提。領袖不管在北平、杭州、成都、昆明等地對各大中學校員生訓話，統統是根據中國目前政治的需要為出發點，在講談之現代的生命方時，也更說：「……我們教育正儘量去深究是什麼呢？說說要我們所屬的部下學生——一切受我們教導的人——使他們個人都能夠懂得做國民與革命的道理，成爲有用之人才，或成功爲現代的國民，要使他們共同一致爲國犧牲！——向立業的光明大道努力前進。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能夠轉危爲安，轉弱爲強，轉貧爲富！」(註三十八)。教育未能政治化，則教育才不能發揮救國的效能，此爲領袖的救國教育基本原則之三。

(四)軍事化 我們要「要戰場變成學堂，把學堂變成戰場」，一切的教育實施，全部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有軍事的知能，健強的身體，集體的行動，嚴密的組織，英勇活潑迅速穩實的精神，冒險耐苦沉着機警的能力，並非是北個個學生，都訓練得像軍隊

一樣。領袖會說：「就現下而言，一個國家，必須所有的國民都能直接從事於戰爭，然後這個國家才可以做一個現代的國家」（註三十九）。教育必須軍事化，然後才能爲現代國家。他又恐怕一般人不解軍國主義教育的意義，所以二十三年九月間，他在四川講演時，曾加以明白的解釋：「我們現在的教育，就是培養我們『公爾思私，國爾思家』，英勇死義，精忠報國的國民。這就是所謂『軍國主義教育』，『軍國主義教育』這個名詞，過去有人要說『軍兵讀武』的教育而不屑講，或不敢講，這實在是大大的錯誤」（註四十）。所以他所說「軍國主義教育」，就是教育上的實施都要軍事化，以達到「自衛衛國」的目的，此爲領袖的救國教育基本原則之四。

（五）革命化 革命離不了教育，教育離不了革命，二者相滲並用，始可見效。領袖告訴我們說：「惟完善的教育始能促進革命的成功，革命一成功，就能使我們中國，使我們中華民族擺脫一切羶絆，脫離種種痛苦，而引渡到光明幸福的大道去了」（註四十一）。現在國民革命沒有成功，敵人的壓迫日甚一日，我們只有應用教育的力量排除難關，使澈底的革命早日完成。怎樣的教育才能完成革命呢？惟有掃除過去教育的缺點，「掃除發財之類，脫離『利己』的思想範圍，才可以達到目的。領袖又告訴我們說：「……尤其在現在的時期，要使教育完善，必須用革命的手段，來把他改革。否則，仍無補益」（註四十二）。所謂革命化的教育，就是革除以前不良的思想和行動，而養成犧牲的精神，英勇

的行動；堅決的意志；以担負民族解放的任務。此為領袖的救國教育基本原則之五。

(六)生活化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教育不能脫離生活而獨立的。領袖以為一切教育的實施，都應從生活上入手，所以他平時教人，對於生活上的一舉一動都很注意的，他說：「我們無論是教學生，教士，或教普的一般民衆，統統都要從衣食住行幾項基本生活做起。食衣住行就是一切教育最中，最基本的原則」(註四三)。他不但注意被教者的生活理想與行動，并進一步謀求其生活之安定，「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倉廩實而後知榮辱」這一句話，是經常引用來向教育界訓育的。尤其是中國人民，貧弱不堪，個人生活，幾乎不能維持，「那裏」空暇時間去受教育呢？所以教育必須生活化，使生活因教育而有進步與保障，教育因生活安定而提高水準，此為領袖的救國教育基本原則之六。

(七)勞動化 所謂「勞動化」，就是不但要學，還要去做，并且要做得合理，使得做和學打成一片，以促進教育的效能，領袖說：「大家要曉得，教育和勞動，是不可分離的，如果只學而不勞動，坐言而不起行，任你學問和理想如何好？也不相干，這樣學問就不是真正學問，所以「教」與「學」一做一，應該要合一，而「勞動」與「生產」一教育一實為不解之連環，而其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使一般學生養成勞動的習慣，發揚服務的精神」(註四十四)。有了勞動的習慣，便可以增加生產，有了服務的精神，便可以為國家

爲人類效勞，所以要想救國，須先使教育活動化，實行做學教的教育，以充實國家社會的力量，此爲領袖的救國教育基本原則之七。

(八)科學化 當此科學昌明之世，一切事業，日新異，我們若不迎頭趕上，非徒不足以挽救國家的危亡，而且將永爲世界上落伍民族。換句話說：我們要復興民族，則非實施科學教育不可，領袖平時對於這一點特別留意，他論推進教育實施的原則時，曾經這樣指示我們說：「特別注意固有德性之培養，強健體魄之鍛鍊，與夫近世科學之灌輸，並非培養吾民族固有優美之性，不足以奠定民族獨立之學本，非提倡體育以增進民族之健康，不足以保障民族之生存，而非注意於科學之灌輸，則國民生產能力與生活技能，無由增進，而違反科學精神之傳統惡習，亦將難由更革也。」(註四十五)。領袖對於教育需要科學化的理由，已經很明白的詳細的解釋，以圖如果不能實施科學化的教育，造成科學化的中國，則不能趕上列強與復興民族，此爲領袖的救國教育基本原則之八。

二 實施方法：

(一)統一學生思想 思想爲行動之母，思想有了統制行動才能合乎正軌。領袖對於統一學生思想一事，非常重視！十七年七月他在北大大演講：「我們中國要在二十世紀的世界謀生存，沒有第二個適合的主義，祇有依照 總理的三民主義，拿三民主義來做一個中心思想，才能統一中國！結果中國各派的思想，不能統一，中國的建設，一定非常困難。」

「（註四十六）……」
就不能一致。因意見不一致，所以行動就不能一致，團體也就不能堅固」（註四十七）。不能團結堅固，國家怎麼能強盛？所以多國教育的實施，必須以三民主義的信仰來統一國民的思想，而能有了堅強的信仰，讀了書才能發揮為教國的功績。

（二）國語品性訓練。領袖對於領袖的訓練，其教育為精神訓練的最高表現，一個人由精神而為行動的發源，所以領袖訓練的方法適當與否，所以領袖非常重視品性訓練，尤宜在「忠孝節義」四德為第一。他以為非提倡人格教育，則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他對於自強學堂學生說：「要做到中國能自己獨立，能富強起來，要把外國人趕走，不為外國人欺侮，這要全靠你們少年學生品行好，守規矩。能守規矩的人，才能學高深的學問，才可以做大事業」（註四十八）。究竟怎樣修好品格呢，他亦曾向自強學堂訓導主任說：「我們自強學堂，一定要提高國民道德做起；而要提高國民道德，必先改良教育，改良教育，先端正學風，要端正學風，必先特別注重訓育！」即注重學生人格訓練。其教育方針，就是要「學生明白做人的道理，能夠『孝父母、敬長上、愛國家、保民族』，能夠『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做到『忠孝、仁愛、節義、和平』八德。』」須如此，然後可以做人，可以做中國現代「的國民」。（註四十九）這就為「精神教育」為根本，學「技術為末務」；和「君子移本，

本立而道生二道前可守的意思，實施救國教育時切切不可忽略之！

(三) 嚴守黨員守則 黨員守則為救國教育的根本法門，實施救國教育時，務須切實注意。俾學能澈底履行，才足以達到救國的目的。黨員守則為：「一、忠勇為愛國之本；二、尊順為齊家之本；三、仁愛為接物之本；四、誠實為立業之本；五、和平為處世之本；六、勤儉為治事之本；七、服從為負責之本；八、勇敢為服務之本；九、輕潔為治身之本；十、勤奮為快活之本；十一、學問為進德之本；十二、有恆為成功之本」。此即黨員十二守則，引用為教育上切實如何實施？ 領袖亦曾指示我們說：「按照黨員守則所列舉的條目，從根本上教他愛國，教他齊家，教他接物處世，教他立業治事，教他負責服務，教他強身助人，教他濟世和衷，成功。而這一切教育的根本科目當中，都要拿中國固有的精神思想和道德——亦就是這整個的中華民族（中華）貫徹其間，使深植於人人內心之中，即如我們要教他愛國，能竭盡心竭力，犧牲奮鬥，就先要教他忠勇；要教他齊家，能夠承先啓後，無忝所生，就先要教他孝順；教他接物，能一有條有理，不暴不殄，就先要教他仁愛；教他立業，能一真實不欺，始終如一，就先要教他信義；我們要教他如何處世，就一定要教他和平，唯可和平是人類永遠不敵的行為基準；我們要教他如何辦事，就一定要教他勤儉，能尊重禮節，能尊重組織和使他的重要；教他能夠負責，就一定要教他服從，能從從才盡責盡義務，能盡責任。……又教他勤奮服務，能勤奮服務；要教

他強身。必須教他整潔。教他如欲得到真正的快樂，必須教他助人；我們要望他能濟世救民，必須教他忠孝節義；若教他愚昧，必害他。他肯誠心，我以為成功之道，除有恆心之外，並無第二法了。（《論學》下二）。他長於則宜教以策救國教育的信條，也就是人生教育的根本宗旨。從這教育着某能這物，這和這指示去實施，教育一定可以達到救國的效果。

（四）指導體育與藝術 領袖以為我們這民族，現在是死於危亡中復興我們的國家民族，就要矯正過去「重文輕武」的弊習，恢復古人「文武合一」的教育，要使全國同胞，無分男男女女都有武藝，一能強身。他這教育武藝是從訓練健壯的體魄入手，而實行方法的要原則，便是要和「然於」文武；空乘，亦「這三件東西奮鬥。他並說武藝應注重武藝精神，可便是古人所說的禮、信、仁、勇、嚴。他舉出「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將這六藝與文武合一教育的內容；又人不學武藝，武人不學文事，這種教育，他平生引以為憾的。他以為要以教育救國的話，必須使所有學生一齊學武藝，恢復中國古時的文武合一的教育。他這教育指示我們說：「我們要能指導一般學生、部下；乃至一般國民都能用材：第一，先由其自然界奮鬥，鍛鍊他們的體魄；第二，要教以禮、信、仁、勇、嚴。之武德；第三，由自然奮鬥，鍛鍊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其主要內容」（註五十二）。教育若能達此實施，那便是最

教育之目的，在於培養健全之國民，以適應社會之需要。

(五) 教育應注重實踐。教育不應僅限於書本知識之傳授，而應注重實踐之訓練。教育應培養學生之實踐能力，使其能適應社會之需要。教育應注重學生之實踐能力，使其能適應社會之需要。教育應注重學生之實踐能力，使其能適應社會之需要。

領袖之責任，在於指導國民，使其能適應社會之需要。領袖應具有高尚之品德，並具有豐富之知識與技能。領袖應能適應社會之需要，並能指導國民。領袖應具有高尚之品德，並具有豐富之知識與技能。領袖應能適應社會之需要，並能指導國民。領袖應具有高尚之品德，並具有豐富之知識與技能。領袖應能適應社會之需要，並能指導國民。

(六) 注重實踐教育。教育應注重實踐之訓練，使學生能適應社會之需要。教育應注重實踐之訓練，使學生能適應社會之需要。教育應注重實踐之訓練，使學生能適應社會之需要。

委員通過的，但這幾個人員是大家舉出來的，委員的意見，也是大家的意見，所以訂了規章以後，大家必須遵守，不能違抗，更不能破壞（所謂守中）。這些規章對他們指導學生自治，決對不能發生障礙。自治範圍以外，還有「自大」「自驕」「自豪」的心理與行動表現；務須以「服從團體規程」為主要原則；此為教師輔導兒童自治時所不可不注意者也。

（八）注意日常勞作 領袖教人，對於日常勞作非常注意；他以為教育宜從生活入手，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操作，均應以學生自為最佳；如墨子少爺的教育，只讀書，不做事；讀了書也真沒有用的，領袖常常說他自己小時候，每天早上要倒夜壺，掃地板；但他很樂意去做，毫不偷懶。廿歲以前，在日本軍官學校讀書，每天早晨掃地板，倒痰盂，掃廁所，洗衣服。他又說：他少年時候，常常幫着做農夫的工作，每天早晨回家，自己去燒飯，有時和母親幫着掃了糞桶，到田中種菜，如此類的日常操作，一動一靜，希望在學校學生，都能夠這樣去做。古人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小時候多吃苦，長大了才能教人。他並訓練學生工作的方法，這曾告訴我們說：「我們教員教學生，總要使他活潑才好，訓練學生行禮，要挺直身軀，不要低了頭不抬起來，現在沒有這種教頭的規矩了。平時裏，要訓練，而且要強。吃飯的時候，不要撒飯粒在地板上；坐立行動，都要端正；」他還說：訓練學生清潔，學生平常對於學生，首先要教他穿衣吃飯

走路各事。我記得我在小的時候，他的母親對於這些事非常注意的。設有不對的地方，就很嚴厲的責備叫來改正」（註六十一）。
價值觀：他得注意學生日常生活勞作，與學生家庭關係至爲密切；效法這種價值，永遠是教育行政的指南，則一效尤著。

以上全原一與方法，係公認的易於理解與應用，故分別陳述，若總括言之，就是：「我個頭被強迫的訓練出來，比別的人強壯，他比別的人要健全我們本身——即須時時刻刻努力來鍛鍊強健的體魄，去獲得勞動的入會，這一切，是強健的體魄，發揚奮鬥勇敢的精神，變成刻苦耐勞與忍耐，去快活的工作，這一切，是強健的體魄，去獲得長族的」（註六十二）。

五 結語

我們的領袖。他不但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事家，而且是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他的偉大事業的成就，都歸功於他善於運用教育的方法與熱心！所以他能統一中國，復興民族，而爲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所擁戴；他的教育理論，都根據他的革命哲學與辯學經驗而產生的；所以真正的教育而產生的；他的教育方法，都是根據他的革命哲學與辯學經驗而產生的；所以真正的教育而產生的；他的教育理論與方法，也只有他一人能夠實際體會、瞭解；惟有他的教育理論與方法，才能夠真正挽救中國的危亡。因此，他的一言一語，皆爲金科玉律；片文隻字，均屬稀世國

實；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負有教育之責者，其尤當重利焉！

本文附註

(註一) 見蔡東蓀著「教育問題」(救國雜誌書店出版)袖的生活與思想第一頁)

(註二) 二二二一年十月三日救國雜誌社發行部函稱：「拉國的教育」

(註三) 見蔡東蓀著「教育問題」(救國雜誌書店出版)

(註四) 見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編「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長會錄」

(註五) 見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編「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長會錄」

(註六) 見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編「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長會錄」

(註七) 見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編「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長會錄」

(註八) 見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編「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長會錄」

與民族

(註九) 見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編「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長會錄」

(註十) 見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編「三民主義青年團教育委員會長會錄」

(註十一) 二二二七年八月創刊在中央訓練部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話：「革命的教育」

(註十二)見領袖在江西黨化教育講習所講演——三民主義的要義

(註十三)見二十四年五月領袖在昆明光華體育場對中學以上學校員生訓話——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底要道

人與復興民族底要道

(註十四)見汪世傑著領袖的教育思想(載拔提書店出版領袖的生活與思想)

(註十五)見領袖著新黨意志——教育序言(中華書局出版)

(註十六)見領袖在江西黨化教育講習所講演——三民主義的要義

(註十七)見十九年四月領袖在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演講——教育完全學風起良革命才有希望

有希望

(註十八)見二十一年領袖在長沙黨政軍學擴大紀念週講演——惟有教育與經濟方可救

國家與民族

(註十九)見二十一年一月領袖在漢口武昌學校講演——學生要學做好人

(註二十)見二十三年六月領袖在南昌行營對省會各中學校校長學生講演——立志爲學

與服務

(註二十一)見二十四年七月領袖在成都四川中學講演——爲革命的與三學要義

(註二十二)見二十七年八月領袖在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話——革命的教育

(註二十三)見二十一年領袖在長沙黨政軍學擴大紀念週講演——惟有教育與經濟方可

領袖的救國教育思想及其方法

四二

救國家與民族

- (註二十四)見二十三年二月領袖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週講演——新生活運動主要義
- (註二十五)見二十三年五月領袖發表之新生活運動綱要
- (註二十六)見張治中講述蔣先生之人格與修養(拔提書店出版)
- (註二十七)見二十年一月五日領袖在中軍校講演——軍人的入生觀
- (註二十八)同上
- (註二十九)參考教與學三卷十期陳立夫著教育與建國之要道
- (註三十)見二十七年八月領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詞——革命的教育
- (註三十一)見二十年四月領袖對浙江大學講演——求學先要立定志向
- (註三十二)見二十三年六月領袖在南行營對省會各中學校校長學生講演——立志為學與服務
- (註三十三)見二十七年八月領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詞——革命的教育
- (註三十四)見二十四年領袖在昆明光華體育場對中等以上學校員生講演——為學做人
- 與復興民族底要道
- (註三十五)見二十七年八月領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詞——革命的教育
- (註三十六)見二十七年七月領袖在北大第三講演——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的思想

(註三十七)見領袖在江西黨化教育講習所演講——三民主義的要義

(註三十八)見領袖的生活與思 第一一〇頁(拔提書店出版)

(註三十九)見二十三年三月領袖在行營擴大紀念週演講——新生活——意義和目的

(註四十)見教與學三卷八期二〇頁蔣委員長教育名言(二)

(註四十一)見十九年四月領袖在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演說——教育完全學風純良革命才有希望

(註四十二)同上

(註四十三)見二十三年三月領袖在行營擴大紀念週演講——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

(註四十四)見二十四年七月領袖在成都四川大學講演——為學目的與求學要義

(註四十五)見二十年領袖在國民會議舉行閉會式時講演——努力完成訓政的大業

(註四十六)見十七年七月 領袖在北大 三院演講——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的思想

(註四十七)見十八年三月十五日領袖在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講演——統一

黨的思想

(註四十八)見二十年二月領袖在奉化海口武嶺學校講演——學生不單是讀書識字還要

修好品行

(註四十九)見二十四年五月領袖在昆明光華體育場對中等以上學校員生訓話——為學

做人與復興民族——要道

領袖的教育——育思想及其方法

四四

(註五十一)國魂——領袖解釋「國魂」說：「這個國魂，就是包括中國一國固有的歷史文化價值觀和民族思想以及五千年來一切精神物質的創造和積累」(見領袖的革命的教育的演講)。

(註五十二)見二十七年八月領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詞——革命的教育的演講——
(註五十三)見二十七年八月領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詞——青年底責任

(註五十四)見二十七年八月領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詞——革命的教育

(註五十五)見二十四年七月領袖在成都婦女紀念週演講——青年底責任

(註五十六)見二十七年八月領袖對中央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訓詞——革命的教育

(註五十七)同上

(註五十八)見十四年十一月領袖在潮州中學歡迎會講演——學生是學校底主人

(註五十九)同上

(註六十)同上

(註六十一)見十九年三月領袖在奉化溪口武嶺學校演講——學生要勞作要聽父母的話

(註六十二)領袖的生活與思想六十五頁「領袖訓示」(拔提書店出版)